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3.02.008

# 《决译者》中的非洲译者形象与 非洲共通语建构

邹涛

(电子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1731)

**摘要:**著名非洲作家艾伊·奎·阿尔玛的小说《决译者》直面非洲的语言问题,通过一群译者形象将创造非洲共通语这一看似遥不可及的梦想演绎为可能的行动。小说展现出整体系统的思考方式、平等对话的人际交往、教育启蒙模式和阿尔玛对共同体的坚定信念等共同体诗学特征,为新时代的共同体话语建构提供了典范。

**关键词:**艾伊·奎·阿尔玛;《决译者》;非洲共通语;共同体诗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3)02-0057-07

语言跟世界的关系常常是“美学和政治争论的中心”<sup>①</sup>,这一点在非洲文学文化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也因此非洲研究领域备受关注。当下的非洲地方语言林立,却没有一种统一语言可供非洲人彼此顺畅交流,哪怕是同一非洲国家内部的不同族群之间,也往往不得不借用英语、法语等殖民语言来实现跨族群的沟通。但是,殖民语言摆脱不了殖民文化的载体这一根本属性。所以,在非洲人心里,一直闪耀着对非洲共通语的憧憬。来自非洲加纳的著名作家艾伊·奎·阿尔玛(Ayi Kwei Armah, 1939—)的小说《决译者》(*The Resolutionaries*, 2013)将这种憧憬演绎成可能的行动,为解决非洲的语言问题、促进非洲共同体建构提供新的动力。

## 一 非洲语言论争与对共通语的憧憬

统一的非洲语言是泛非主义的重要目标之一,被看作建构非洲文化共同体的重要保障。1959年在罗马举行的第二次黑人作家和艺术家大会的主题为“非洲黑人文化的统一”<sup>②</sup>,会上通

过的议案明确提出了有关非洲共通语的倡议,指出自由、解放的黑非洲不应采用任何欧洲或其他语言作为民族语,而应该委派一批语言学家打造一种便于广泛使用的非洲语言,所有的非洲人除了掌握当地方言,还将学习这一共同的民族语言<sup>③</sup>。

面对非洲复杂的语言使用现状,新创一门非洲共通语显得遥不可及,非洲知识分子纷纷转而探讨使用现成的本土语还是殖民语言这个问题。1962年6月在乌干达麦克雷雷大学举办的非洲英语作家大会(The Conference of African Writers of English Expression)进一步推动关于非洲作家创作语言问题的讨论,阿契贝、索因卡和尚未出名的恩古吉都参与了该会议。会上的语言论争随着尼日利亚留美学生瓦利(Obiajunwa Wali)一年后发表的《非洲文学的死胡同?》(*The Dead End of African Literature?*)一文而持续发酵<sup>④</sup>。瓦利认为使用民族语言才是民族文学的根本标志,批评当时作为非洲最重要英语作家代表的阿契贝对英语

收稿日期:2022-11-2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0BWW060)

作者简介:邹涛(1976—),女,湖南邵阳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非洲文学、比较文学、英美文学研究。

①参见《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杨金才写给“21世纪外国文学研究新视野”栏目的主持人寄语。

②Adi, Hakim. *Pan-Africanism: A History*.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8, p.189.

③宋志明:《“语言非殖民化”:索因卡和非洲文学的语言政治》,《外国文学》2019年第2期。

④颜治强:《关于非洲文学语言的一场争论》,《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的维护<sup>①</sup>。阿契贝在回应中指出非洲英语文学是与新的民族国家相适应的产物,尼日利亚的英语作品才能被看作有足够影响力的民族国家文学(national literature),其他用非洲本土语言写的作品因影响面太小只能称之为“族裔文学”(ethnic literature)<sup>②</sup>。肯尼亚的恩古吉在用英语写作成名后,痛感自己的家人和同胞因不懂英语而无法了解他的作品,转而在用吉库尤语进行创作。第六次泛非大会(1974年6月)也在“关于文化的决议”中指出,“为了使文化真正大众化,应当尽可能地使用我们民族的语言来表达”,并提议“用非洲语言作为书写文字和传播媒介来表达科学思想”<sup>③</sup>。但是,以恩古吉为代表的本土语言选择者的困境在于,讲本族语言的人数往往太少,这使得恩古吉不得不将自己的作品用吉库尤语写后又翻译成英语,无法绕开殖民语言的使用。

尽管大部分人主动或被动地接受现实,但非洲人对非洲共通语的憧憬从未停止。与其他非洲知识分子和作家相比,阿尔玛在创造非洲共通语的问题上更乐观坚定。尽管目前的现实令人沮丧,但他坚信“用一门非洲语言向所有的非洲人说话”这个目标是“可直接感知并最终可实现的”<sup>④</sup>。他以苏联时期的语言使用政策为例,指出苏联的每个民族既保留自己的语言,同时又共同使用俄语,才形成了文化凝聚力和传播力。因此,作家这类语言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之一,是帮助非洲走出语言困境,为非洲的统一创造出一门像苏联时期的俄语那样的共通语言。

为何不直接将现成的使用最广的某种殖民语言或本土语言推广为非洲共通语呢?阿尔玛认为使用殖民语言是让非洲人回到问题的起点,对解决非洲语言问题毫无用处。他提议在目前使用相对广泛的斯瓦希里语等语言的基础上,吸收古埃及语等富含非洲智慧的语言元素,改造出一门新的便于快速推广的新语言。阿尔玛反对把斯瓦希里语直接推广为非洲共通语,是因为认为该语言有两个瑕疵,其一是它作为一种贸易混合语吸收

了太多的阿拉伯语元素,其二是这会给本来就讲斯瓦希里语的人带来事实上的优势而引发不公平。所以,他希望从承载着灿烂文明的古埃及语以及当下的各种非洲语言中简化出“一套人人可及的字母系统”。阿尔玛的最新长篇小说《决译者》正是他吹响广泛动员语言工作者投入创造非洲共通语这项伟业的号角。

## 二 《决译者》的文本内外语境

《决译者》是阿尔玛第八部长篇小说,花了十年才完成。他在《决译者》正文前写了题为“与读者的对话”(A Conversation with the Reader)的前言,简要说明自己创作此书过程中发生的思想转变。他原本计划针对非洲以翻译谋生的人写一篇讽刺小说。可是,“主要人物开始成长,他们中一些人开始将小说拉离讽刺轨道,而朝着更具沉思色彩的方向发展。开始时是一个,接着两个,直至四个人物走上探究的道路,各自寻找下面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果我们帮着改变社会现实而不只是忍受它,情形会怎样?”

为了引导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推动社会变革,阿尔玛不得不花更长的时间,在源远流长的非洲历史中逡巡,努力在各种文献资料中寻找线索。他吸收的思想资源包括海地的安东尼·菲尔明(Antonin Firmin)、美国的詹姆斯(J. M. G. James)和威廉斯(Chancellor Williams)、非洲的迪奥普(Cheikh Anta Diop)和奥本嘉(Theophile Obenga)等研究非洲历史文化的先驱。最终,他的答案以《决译者》这本充满对话色彩的小说呈现出来。“对于我的思考方式而言,小说提供了作者与读者对话的可能性。”

阿尔玛创作《决译者》的心路历程可看作他整个创作生涯的缩影。他一生为非洲统一而奋斗,但最开始的时候,他曾栽倒在美好理想和残酷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里,创作的笔调较多灰暗和讽刺,当他从非洲文化内部获得越来越多的疗愈力量之后,他的创作日益积极乐观,重心转向探索

<sup>①</sup>Wali, Obiajunwa. “The Dead End of African Literature” (1963). *Transition* 1997 (75/76) (The Anniversary Issue: Selections from *Transition*, 1961—1976): 330—335.

<sup>②</sup>Achebe, Chinua. “English and African Writer” (1965), *Transition* 1997 (75/76) (The Anniversary Issue: Selections from *Transition*, 1961—1976): 343.

<sup>③</sup>唐大盾选编:《泛非主义与非洲统一组织文选(1900—1990)》,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5,96页。

<sup>④</sup>Armah, Ayi Kwei. *Remembering the Dismembered Continent*. Penguin: Per Ankh, 2010, p.125. 后面来自此书的引文不再标注。

解决问题的建设性方案。《决译者》展现出作者强烈的使命感,小说中想要充分发挥自己的语言禀赋来促进非洲统一的主人公们正是阿尔玛精神的化身。

为何要聚焦译者群体?一方面,译者职业本身可看作是非洲大部分国家被殖民状态的一个隐喻。译者转述别人的话,而不发表自己的见解。在殖民时期,非洲绝大部分地区唯西方马首是瞻。民族独立之后,大部分非洲国家上台的领导人通过顺从西方来保障自己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就如同工作状态时的译者一样,非洲人整体上无法发表自己的见解。在小说中,以纳芙特为代表的觉醒的译者不满足于只当传声筒,那些在她看来极其荒谬的讲话内容让她深感厌倦而产生拒绝翻译的冲动,“那些词语进入我的意识中,它们生硬粗暴,不受欢迎”。她从服务对象、翻译内容的殖民主义性质中照见了非洲精英们的尴尬处境:“想要改变现状,却通过维持现状来挣钱。”

另一方面,在非洲,译者,尤其是常出入各类高级别会议的本土译者,是最熟悉西方(新)殖民主义运作机制和非洲内部问题的知识分子群体之一。他们替非洲不同国家之间的政客或高级别代表传话,为非洲政客和西方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的领导们相互传话,并帮助撰写会议决议的不同语言版本。各种会议本身的无意义促使部分译者反思自己工作的价值,在工作中对现实问题的近距离接触也有利于他们改变现状。正如主人公朱蒂所说,“作为笔译和口译者,我们正好见证了我们的社会被管理的方式方法”,“我们处于看清问题的绝佳位置,可以努力寻找改善社会的方法”。

如何理解小说标题“The Resolutionaries”?“resolutionaries”是阿尔玛生造的新词,应该是由 resolution(决议)和 revolutionaries(革命者)这两个词融合而成,表达阿尔玛对从决议走向行动的革命者的呼唤。我们将标题译为“决译者”,意指见证了无数决议被搁置而决心推动社会变革的译者群体。

阿尔玛的语言文化观使他想要充分发挥非洲译者的高超语言禀赋,来承担整理和弘扬传统文化精髓、助力非洲自我再教育的重任。非洲译者因多语种的生存环境,练就极高的语言能力,往往能讲多种欧洲语言和多种非洲语言。小说中的主

人公朱蒂能做英语、法语、阿坎语、斯瓦希里语的翻译,本嘉能做英语、法语、拉丁语、希腊语、古埃及语、林加拉语、班图语的翻译。阿尔玛借本嘉(Benga)之口指出语言是“信息存储系统”,是“一把万能钥匙”。在他眼里,一门非洲共通语是“通往非洲统一这扇巨门的钥匙”。

阿尔玛本人正是通过学习古埃及语、多种非洲语言和相关文献,惊喜地了解到非洲文明悠久的历史和高超的智慧,进而通过翻译或创作来普及这些知识。譬如,他与人合作,用英语和法语为非洲儿童编写了一本古埃及文字的入门教材(*Hieroglyphics for Babies*),还将一首古埃及爱情诗翻译成 12 种语言(包括英语、法语、葡语 3 种欧洲语言,以及 9 种非洲语言)<sup>①</sup>。该译本前半部分是导读,用 12 种语言写成,后半部分则逐行翻译该爱情诗,每页内容只有一行的原文及 12 种对应的译文,有趣的内容、精心的排版为阅读者比较不同语言间的异同提供了极大便利,为创造非洲共通语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工具。

在《决译者》中,阿尔玛通过不同的译者来演绎自己的理想,下面将分析该作品中的译者形象来展现阿尔玛如何建构非洲共通语和非洲命运共同体,并展现阿尔玛的共同体诗学。

### 三 对待译者困境的反思者和实用主义者

小说采用一名出色的女译者纳芙特(Nefert)的第一人称叙述。纳芙特曾在本国外交部的语言部门工作了三年,见证了无数高级别会议决议的产生过程,并因此反思非洲译者职业的荒诞性,“非洲人将一种欧洲语言翻译成另一种欧洲语言,以便让其他非洲人能相互理解”。她强烈渴望改变现实,属于译者群体中的反思者和早期觉醒者。

小说通过纳芙特和同行好友萨丽(Sali)的对话和互动来展现对非洲译者的困境与出路的思考。纳芙特向萨丽指出非洲译者的痛苦起源:想要购买奴隶的第一批欧洲殖民者因为语言障碍而无法达成目的,于是他们将海滩边的非洲人绑架或哄骗上船,带到欧洲教会他们欧洲语言,然后再带回非洲,为殖民者与非洲本地权贵之间的交易

<sup>①</sup>Shemsu Bak (Workgroup). *On Love Sulime: A Multilingual Translation of an Ancient African Love Poem*. Per Ankh, 2018.

做翻译。在纳芙特眼里,现在的非洲译者和最初服务于奴隶贸易的译者在功能上并没有本质区别,都是在帮助交易双方将西方在非洲的全球化活动粉饰为“博爱而非掠夺”。因此,她对翻译工作越来越有负罪感和抵触情绪,觉得这样持续走下去等于主动延续殖民主义对非洲的伤害。她还将这种困境推及所有非洲精英,认为他们“一直使用殖民语言使得非洲社会持续分裂”。她进而意识到,只有非洲走向统一,才可能摆脱自己意识到的非洲译者的伦理困境。相应地,她对泛非主义“统一非洲”的理念满怀期待。但是,在泛非会议上当翻译的经历让她陷入深深的失望中,觉得来自海内外的代表们飞来“表达非洲必须统一的豪言壮语,然后飞回去,一切照旧。这真是昂贵的表达常识的方式”。

面对纳芙特的痛苦感受,萨丽以实用主义心态劝她活在当下,“在工作时封存自己的情感和思想”,“面对唯一不得不做的事情:谋生。即便不为自己,也要为自己的孩子”,不要天真地“想把打非洲统一牌的玩家转变为谋划未来的正经人”。萨丽的这种态度与她对译者的定位不无关系。她认为译者只是信息的搬运工,拒绝为信息内容承担伦理责任,也因此免受伦理的困扰。她清晰阐述了自己和纳芙特的区别,指出她的实用主义的另一个心理根源是摆脱创伤:“我们之间的不同在于你将当下所见和未来的梦想相比较,而我将每件事情和过去的噩梦相比较。我希望将噩梦留在过去。我不仅看见了它,听闻了它,而且亲身经历了它。我庆幸自己挺过来了。所以,我紧盯着现实,不让自己眨眼。”萨丽的话传递出非洲实用主义者的典型心态:生存问题远比语言这类精神问题更重要。殖民统治下的创伤如噩梦缠绕,只要当下境遇稍加改善,能帮自己摆脱噩梦过往,现实就变得容易接受了。

与萨丽通过专注个体和当下生活来忘掉创伤不同,纳芙特的眼光面向集体和未来,想要防止历史悲剧戴着不同的面具重新上演,尤其警惕自己成为悲剧重演的参与者或者帮凶。纳芙特虽然有体面的工作和收入,但无法只求独善其身。正如她自己所说,“我无法不在思考我是谁的同时想

到我们是谁”,“无法将自己和社会切割开来思考。毕竟那才是真正的人性”。所以,纳芙特看到的是非洲统一、人人幸福这一社会梦想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而萨丽看到的是操作层面的“不切实际”、生活的紧迫性和生命的短暂性。

纳芙特和萨丽对译者困境的心态看似矛盾,那她们友谊的根基何在呢?萨丽和纳芙特一样洞察非洲译者职业本身的以及从职业中窥见的现实的荒诞性,只是努力找理由为自己编织一个保护硬壳,防止这些黑暗侵蚀自己。纳芙特看到了萨丽保护壳下的脆弱:“她决意不让任何事情击倒自己。但某种东西告诉我她是消沉的,和我一样消沉,只是她不愿承认罢了。”正因为这种内在的深度理解和外在的风格互补,她们两人可以相互支撑、相互促进。在思想上,纳芙特帮助萨丽进一步直面现实,对译者所面临的问题保持警醒。在行动上,纳芙特的面向未来常因巨大的挑战和焦虑而影响到当下的行动效率,有时不免陷入抑郁和无助中。此时,面向当下的萨丽能够拽着纳芙特快速解决现实中的迫切需求,以维持生活的正常运转。她们俩不仅展现出非洲译者如何通过互助而超越现实的种种荒诞,同时也表明只有将过去、现在与未来连成一个有机整体,才能真正改变译者的困境。

#### 四 共同体开路人与使命的传递

纳芙特是仍处于迷茫中的早期觉醒者,觉醒于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对未来的担忧和想参与改变现实的强烈渴望,迷茫于找不到摆脱困境的出路,因此需要开路人的进一步引导。小说中扮演开路人的角色是纳芙特的男性同行朱蒂以及与朱蒂亦师亦友的本嘉。

本嘉在小说中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他和朱蒂的父亲属于同一代人,两人的合作演绎是阿尔玛渴望的谢克·安塔·迪奥普和恩克鲁玛相遇的美好可能。阿尔玛哀叹迪奥普和恩克鲁玛在有生之年未能相遇相知,否则历史可能改写<sup>①</sup>。迪奥普是推动非洲文化统一的杰出学者、思想者,恩克鲁玛则是促进非洲政治统一的行动者,他们两个如合作则可形成阿尔玛眼中的完美的“心脑协

<sup>①</sup>Armah, Ayi Kwei. *Remembering the Dismembered Continent*. Popenguine: Per Ankh, 2010, pp.290-291.

同”(heart-and-mind synergy)<sup>①</sup>。在《决译者》中,本嘉是古希腊罗马文化领域的大学教授,他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欧洲人以古希腊罗马为文化源头,而古希腊人却不断描述比他们更古老的古埃及,这促使他转而研究古埃及文字以及历史。

也许是弥补因恩克鲁玛和迪奥普所代表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未能合力而带来的巨大遗憾,阿尔玛在小说中让朱蒂父亲主动邀约本嘉结伴同行,展现出历史的另一种可能性,以引导当今社会。朱蒂父亲卢蒙巴的现实原型是阿尔玛非常敬重的非洲民族解放英雄——刚果(布)(原扎伊尔)首任民选总理帕特里斯·埃梅里·卢蒙巴,而本嘉可能对应的是刚果(布)的著名非洲历史学家泰奥菲尔·奥本嘉(Theophile Obenga)。卢蒙巴总理在 20 世纪六十年代初因反抗西方霸权而惨遭暗杀,给当时正在哈佛大学读书的阿尔玛异常沉痛的打击,迫使阿尔玛认清了西方民主的虚伪本质。小说中的朱蒂父亲处处有着卢蒙巴总理的影子,他是信奉泛非主义的刚果政治家,“创立社会运动结束了欧洲在刚果的殖民统治”,并邀请本嘉来为党员积极分子组织非洲历史的讲习班,进而激发出他们探究古埃及的浓厚兴趣。在本嘉眼里,朱蒂父亲是一个“觉醒者”,“思考的总是非洲,而非他自己、他的家人、他的族群。思考着非洲如何共同崛起”。

阿尔玛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为非洲共同体奋斗的领袖被西方势力暗杀后,如何激励后人继续未竟的事业?本嘉在这个小说中的角色正是为解决这一问题而存在的。他是革命先烈和后继者之间的桥梁,因学者的智慧而成为同辈政治家的智囊,在同辈政治领袖牺牲后,又承担起培育领袖后代和更多年轻人前赴后继的责任。在小说中,本嘉帮助朱蒂走出丧父的心理阴影,陪伴他不断成长。朱蒂曾憎恨父亲早早离世,感觉自己被他抛弃了,而且,他觉得做坏事的人才会被杀。本嘉向朱蒂解释了其父所做事情的意义,使他明白父亲“是一个想要为所有孩子设计美好明天”的可爱之人,而他的对手们只想为自己的孩子、为自己的小团体谋取最大利益。这逐渐使得他“每想到父亲的工作时就全身感到温暖”,觉得自己如果继续父亲未竟的事业,就可以真正地靠近父亲,

就是哀悼父亲的最好方式。

本嘉不只是朱蒂的人生导师,对纳芙特、纳芙特幼小的儿子、萨丽以及众多对参与社会变革持怀疑态度的人,都不同程度地产生影响。他通过回答他们的疑问或者批驳他们受殖民主义影响而产生的错误观念,来指引他们前进的正确方向,激发他们参与变革社会的内在动力。

当译者们认为创造一门非洲共通语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时,本嘉指出这种观念里潜藏的殖民思想烙印:“如果一个非洲人相信非洲从没发展出一种共通语言和文字系统,从未发展出科学技术,那么他/她尚处于睡梦中,处于被基督教、伊斯兰教或者欧洲优越论思想麻醉的状态中。”他进而指出,在民族独立的时候,正是殖民主义的精神催眠术使非洲国家领导人依然选择殖民者的语言和管理系统,认为“非洲没有可供利用的社会组织和语言”。

在本嘉和朱蒂看来,创造非洲共通语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在已有的非洲古代与现代语言中寻找共核的东西,从中创造出“一套理性的、便利的字母”;第二步是基于这套字母,从古代语言中选出“最悦耳、最合理的词汇,恢复它们的活力”,其基本目标是从源头性的古埃及语出发来建立一千个单词的基本词汇表;第三步是结合当下的生活语言素材创造出非洲共通语的体系。譬如,在词汇层面,将那进入最后名单的古代基本词汇和当下的非洲语言词汇比较,“一旦发现相匹配的,就优先选出来,以增强熟悉度”。

当译者们感觉目前参加讨论的人数太少,应把学术圈的人包括进来时,本嘉指出:“一个大的学术会议会成为官僚们永无休止的舞蹈。我们此时此刻聚焦一两个问题,并确定解决方案。其他人可以后面加进来。一旦我们开始工作,其他人来的时候就有东西展示给他们了。”

本嘉和朱蒂在思想和行动上的开路,形成了一个共同体的能量场,让越来越多的译者开始倾听、反思、觉醒。

## 五 从觉醒到共通语行动者联盟

朱蒂在积极而耐心地寻求志同道合者的过程中惊喜地发现了纳芙特,两人由此建立了传播能

<sup>①</sup>Armah, Ayi Kwei. *Remembering the Dismembered Continent*. Popenguine; Per Ankh, 2010, p.305.

量的新节点。朱蒂的名字 Jewhty 本意是测量员(The Measurer), 往往用来指掌管记忆、时间、质和量等知识文化的神灵, 可以泛指识字能力和文化<sup>①</sup>。该名和他致力于创造非洲共通语来实现非洲文化复兴的使命相契合。

当一群口译者目睹上台发言的总统说着蹩脚的英语闹出难堪的笑话时, 萨丽、纳芙特和朱蒂的不同反应体现了三种不同的文化心态。萨丽感受到的是搞笑式的闹剧, 忍不住在口译亭里笑出了声; 纳芙特则从作为发言者的总统的尴尬中照见了自身的困境、非洲的困境, 产生一种强烈的悲剧感, 忍不住伤心流泪; 朱蒂则非常冷静, 在萨丽爆发出笑声之前及时关闭了口译亭的麦克风, 防止了尴尬局面的恶化。当萨丽问纳芙特为何落泪时, 朱蒂替纳芙特答道: “我想, 她难过不是因为某个人说的英语太糟糕。难过之处在于, 我们使用的都不是我们自己的语言。这些语言过去常用来虐待我们, 有时用来表达对我们的极端仇恨。想想忍受了某些人数百年的虐待, 最终却通过抛弃我们自己的语言、拥抱他们的语言来向他们致敬。这样的事情正在发生着, 而我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我们必须承认这让人沮丧。”朱蒂如此清晰地表达出纳芙特心中的痛苦, 使萨丽动容。萨丽急切追问朱蒂有何具体解决方案, 她的追问标志着直面问题的开始, 标志着萨丽也开始朝觉醒者的方向迈进。

朱蒂向萨丽和纳芙特提供的方案是: 在以翻译为谋生手段的同时, 充分利用业余时间来“设计属于我们自己的语言”。在朱蒂看来, 非洲统一需要各行各业的共同努力: “工程师可以为连接非洲大陆的道路而工作, 经济学家可以设计一种非洲通用货币, 我们则设计出非洲共通语。”萨丽尽管觉得这样的方案“大得不切实际”, 但是却前来参加了相关讨论会。

朱蒂超越历史创伤和当下现实困难的能力对纳芙特和萨丽都有疗愈作用。朱蒂在幼年时因父亲被人谋害而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创伤, 但他长大后却保持追求社会理想的坚韧与热情。纳芙特从朱蒂身上感受到榜样的力量: “朱蒂比我更有理由被深深影响当下的历史罪恶压垮。然而, 他冷

静地接受了现实, 坚定地、安静地创造未来, 忙得没有时间焦虑。”朱蒂觉察到纳芙特和他一样在寻找改变现实的方式, 向她发出深情的邀约: “我看到了你, 探索路上的伙伴。”培养和寻找共同改变社会的同道中人是阿尔玛写作的重要目标, 他自述道: “我已经习惯做一个不断等待的探索者, 等着联系上其他探索者, 共同来做我相信的事业。”他通过不断地塑造理想的人物以“不让绝望侵蚀自己对追寻目标的记忆”, 并且“防止生活毁掉我们连接的能力”<sup>②</sup>。

萨丽这个角色最深刻反映了阿尔玛对译者的整体态度从讽刺到理解的过程。在朱蒂和本嘉一起动员译者们创造非洲共通语的小会议上, 萨丽坦率而尖锐地提出诸多挑战, 而朱蒂和本嘉一一耐心回应。萨丽从他们身上找到了超越个人创伤的方法: “我听到了本嘉和朱蒂的声音。他们说, 如果我们有悠久的历史, 我们不必抛弃历史而纠结于近期所受的伤害。这很有道理。我个人生活中的可怕记忆仍颇有影响, 但是还有如此多更有意义的其他事情。”

萨丽从质疑转向接受创造非洲共通语这一神圣使命, 在别的译者提出非洲共通语会剥夺译者的工作机会时, 主动宽慰他们工作机会不减反增, 理由是各类学校需要译者将大量的阅读材料翻译为非洲共通语, 而且在和世界交流时, 需要将非洲共通语翻译成各种外国语言。萨丽进一步提议大家可从不同的当代非洲语言中寻找共核词汇开始, 这使大家从尚未学习古埃及语言的畏难情绪中脱离出来, 真正启动非洲共通语言的创造过程。

阿尔玛对萨丽转变过程的细腻呈现, 使她成为该小说中刻画得最为丰满的人物。萨丽代表所有饱受历史创伤但依然有着顽强生命力的非洲人, 是阿尔玛特别想唤醒为行动者联盟的主体。萨丽的姓“Ka”来自古埃及, 意思是“精神”(spirit), 正有传承古埃及以来的非洲精神之意。

## 结语

阿尔玛的《决译者》体现出一种独特的共同

<sup>①</sup>Armah, Ayi Kwei. *Remembering the Dismembered Continent*. Popenguine; Per Ankh, 2010, p.298.

<sup>②</sup>Armah, Ayi Kwei. *The Eloquence of the Scribes: A Memoir on the Sources and Resources of African Literature*. Popenguine; Per Ankh, 2006, pp.98-99.

体诗学策略。首先,在主题上,他表达了统一的文字和语言是建构非洲共同体之精神钥匙这一坚定信念,最难能可贵的是还通过人物演绎了建设非洲共通语的具体操作步骤,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其次,在视野上,小说通过各种会议发言与讨论将经济、政治、教育等诸多非洲发展的核心问题揭示出来,充分展现出各方观点和利益立场,体现出阿尔玛思考问题的整体观、系统观。再次,在人物设置上,他注重的是人物如何在互动关系中成长,并逐渐形成共同体奋斗的坚固同盟,展现非洲集体主义精神的底色<sup>①</sup>。最后,他采用对话体展开情节,让觉醒者、先行者精彩回应针对非洲共通语这项艰巨任务的各种质疑,设计各种不同场合针对不同层次的人反复传达洞见,使更多人不断加入觉醒者的队伍,形成行动者联盟。发问者包括译者、学者、文化程度低的人甚至小孩,觉醒

者都以一种发问者能懂的方式回答。这是一种面向大众的启蒙文学方式。这种平等对话以及反复言说主旨的交流模式吸取了非洲的口头和即兴表演艺术的精华,具有很强的感召力,展现出一个可与雅斯贝尔斯倡导的在平等对话中点亮心灵的教育理念<sup>②</sup>相媲美的非洲版本。

阿尔玛的共同体诗学将文化寻根、创伤治疗、未来构想融为一体。相较于身处西方的作家如石黑一雄和古尔纳的“往事不堪回首”模式的记忆书写<sup>③</sup>、乔纳森·萨弗兰·福厄消解共情的解构式书写<sup>④</sup>,《决译者》努力从历史的尘埃中挖掘光明、寻找超越创伤的良药、呼唤和肯定共情的能力。《决译者》的意义,不只是启蒙非洲民众,更可用于唤醒所有被西方中心主义、殖民主义教育所蒙蔽的知识分子。阿尔玛的共同体诗学,对于我们建构共同体话语具有很好的启示意义。

## Construction of an African Common Language Through African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in *The Revolutionaries*

ZOU Tao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611731, China)

**Abstract:** The famous African writer Ayi Kwei Armah, through his newest novel *The Revolutionaries*, provides inspiring ideas on how to create an African common language which seems mission impossible to most people. That novel, in which a group of African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experience their spiritual awakening and blessedness in undertaking together the mission of common language creation, illustrates a firm belief in community, a systematic way of thinking, a dialogic and equal mode of education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which are key features of Armah's poetics for community.

**Key words:** Ayi Kwei Armah; *The Revolutionaries*; African common language; poetics for community

(责任校对 葛丽萍)

①邹涛:《奥西里斯-伊西斯神话与阿尔玛的非洲文化复兴叙事》,《当代外国文学》2022年第4期。

②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童可依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2页。

③周博佳,杨金才:《〈被埋葬的巨人〉中的历史书写与记忆重塑》,《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袁俊卿:《“最后的礼物”:阿卜杜勒拉克·古尔纳的沉默叙事》,《当代外国文学》2022年第2期。

④许希夷,杨金才:《乔纳森·萨弗兰·福厄〈特别响,非常近〉中的历史书写》,《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